

# 第一章 绪论

## 1.1 引言

古今汉语的语法尽管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地方，但是差别显著，跟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拥有许多新的语法标记和语法形式。比如先秦汉语没有判断词“是”，唐代以前不存在把字句，宋代以前缺乏体标记系统“了、着、过”，元明以前不见动词拷贝结构，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鲜明语法特点。人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汉语会在历史上引进这些结构而不是别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引进而不是其它时间？到现在为止，汉语历时语法学对某种现象产生在什么时期已经做了一些比较扎实的工作，但是我们对于“为什么”之类的问题知之尚少。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探索语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找到语法发展的原因。

从外表上看来，新的语法现象的出现不是一种随机现象。我们所看到的语法史不是这个时期出现一个现象，那个时期出现一个现象，而是一组重大的事件集中发生在某一特定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则都是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变化。语法的发展就好比一首交响乐，整个语法史有一个主旋律，也有高潮和低潮。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变化纯系偶然，还是有内在的联系？本书思考问题的一个特色就是，把历史长河中的语法也看作是一个系统，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找出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

最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的语法化理论为实现我们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下面首先以汉语的历时事实来说明语法化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 1.2 语 法 化

在普通语言学领域，语法化已成了一个热点。汉语的“语法化”一词源于英语的 grammaticalization，但是最常用的英语词典还查不到这个词，即使新出的语法学词典一般也看不到它。由此可见，“语法化”是一个新创的学科术语。在汉语历时语言学界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但是也不容易说出它的确切定义。根据普通历时语言学的有关定义，并考虑到汉语句法形态发展的特点，我们给“语法化”下一个定义。

语法化——一个新兴语法手段产生的历时过程。语法手段包括语法标记和语法结构两大类。在汉语语法史上，一个语法化过程往往同时涉及到新标记和新结构的产生，两者经常是同一变化的两个方面。比如处置式的发展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指示谓语中心动词之前受事名词的语法标记“把”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引起新语法格式“把”字句的产生。

下面我们以完成体标记“了”的产生和动词拷贝结构的形成为例，说明语法化过程的特点和所涉及的因素。

一个词语的语法化过程具有各种各样的外部特征。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语法特征来判定一个词语是否发生了语法化，或者语法化的程度如何。下面是一些常见的语法化特征。

一、一个词语一旦语法化，就会失去独立运用的能力，而成为一种附着成分 (clitic)。例如，十世纪之前的“了”是一个普通动词，既可以单独作谓语，又可以作连动式的第二个动词。但是，当“了”成为一个体标记之后，它不再能单独用作句子成分，只能附着于主要动词之后表示动作作为进行的状况。

二、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往往涉及到两个成分的重新分析，会改变原来词语的词汇边界。比如，随着“了”由普通动词变成一个体标记，它与谓语中心动词之间也发生了重新分析，其间的边界消失。表现为，谓语中心动词和作为普通动词的“了”之间可以插入否

定标记、各种副词或者受事名词，但是经过重新分析，谓语中心动词和体标记“了”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它们之间不再允许任何成分插入。

三、一个语法化过程常常涉及到两个成分的重新分析，而两个成分的重新分析必须在紧邻的句法环境中进行。普通动词的“了”是在连动式的第二位置上被语法化的，虽然它与主要动词之间常有副词或者受事宾语相隔，但是它是在没有任何插加词语出现的句法环境中首先虚化的。

四、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往往会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主要表现为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 [ɤ]、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比如体标记“了”在现代汉语的语音形式是 [lə] 没有声调 韵腹是个含混的央元音 然而它作为普通动词时则有自己独立的声调，韵母是个复合元音<sup>①</sup>。

五、词语的语法化可以改变所在短语结构的韵律特征。比如在“了”没有虚化之前，它跟主要动词一样都负载一个重音，但是语法化之后，它与主要动词构成的韵律格式就成了：重音 + 轻音。

六、一个词语虚化为一个语法标记之后，其用法和使用范围还会受到它原来词汇意义的影响。比如“了”本为一个及物动词，意为“完成”，常跟在及物性的主要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完成。因此，在“了”语法化的初期（大约十至十三世纪）只能与及物动词搭配，到了后来才慢慢可以跟不及物成分共用。

七、一个词语的语法化常常会促使其原来意义的抽象化，退化掉一些原来的具体词汇意义。比如“了”的语法化使其失去了具体的动作行为和及物性的含义，但是与此同时，它获得了表示动作行为相对时间位置的功能。

语序变化对一种语言的句法形态组织具有深远的影响（Hopper 和 Traugott 1993:50）。如前文所述，新语法标记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新语法结构的出现，两者是同一发展的两个方面。上面讨论了新语

<sup>①</sup> 根据李珍华、周长楫的《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北京），“了”在中古汉语的拟音为 lieu。

法标记产生时的一系列特征，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一个新语法结构出现时有哪些典型特征。

一、一旦一个组织被稳固下来成为一种语法结构，其中的各个成分之间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或者限制。比如动词拷贝结构中的第一个动词必须是基式（非限定的），不能加体标记，不能重叠等等，而第二个动词才可以加这些语法标记。

二、结构中的一些成分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动词拷贝结构要求受事名词和补语，两者缺一不可。但是在一般句子里，这些成分都不是必需的。

三、结构中的成分一般具有某种语义特征。比如动词拷贝结构中的受事名词通常要求为光杆、无指的名词。

四、整个结构表达一个稳定的语法意义。比如动词拷贝结构表示“通过作用某种对象达到某种结果”。

关于语序的变化，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当人们说到历史语言学中的语序变化时，通常指的是 S、V 和 O 三个基本成分的线性顺序的改变。但是应该认识到，语法结构的改变远不限于此，这一点对理解汉语的语法化历史很重要。人类语言发展的共性表明，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制约着它语法手段的种类。比如，当一种语言由 OV 变成 VO 时，它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范畴会逐渐为短语结构（*periphrastic*）所替代。根据 Hopper 和 Traugott(1993:52) 英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十五世纪左右它由 OV 完全变成了 VO 之后出现了很多用短语表示的语法范畴。因为汉语的基本语序从古至今都是 SVO，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法化的方向和语法范畴的表达方式。结果，其他语言用形态表示的语法范畴，汉语则多用短语结构表示。同时我们应该明白，由于中古汉语的发展，汉语大量出现了受事名词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格式，这促使很多类似形态标记的出现。基本语序和语法化的关系是我们理解汉语句法形态史的一个关键。

### 1.3 句法理论框架

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从各个时期的口语资料中总结规律，任何规律都要有足够的经验证据，任何规律都要经得起经验事实的考验。在这个领域里，纯粹的理论假想、思辨不大能找到它们的市场，而且指导历史考察需要有尽量少的理论前提和假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在观察语言事实时才会保持最大的客观性。以下就是我们总结语言规律时应该考虑的最基本的因素。

一、语法单位。语法单位包括语素、词、短语、从句和句子。语素是最小的、不能再分析的、具有意义的语法单位；词是最小的、最基本的、可以独立运用的语法单位。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构成的单位叫做结构。

二、结构层次。结构层次是指一组语法单位如何通过句法规则形成一个具有意义的结构体，强调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是有远近之分的。

三、线性序列。线性序列是指一组语法单位先后的排列顺序。

四、词类范畴。词类范畴是根据词语的语法特征对词语所分的类，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助词等。

五、语法关系。语法关系是指位于同一结构体中的各个语法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着眼于成分之间的语序排列，主要包括主语、谓语、宾语、状语、补语、定语。

六、语义角色。语义角色是指两个成分之间的语法意义关系，该关系不因语序的改变而改变，主要有施事、受事、动作、结果、修饰等。

上述所列的这六个特征，是对包括汉语在内的所有历史语言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 (Harris 和 Campbell, 1995:9)。对于我们的研究，这些特征不仅是基本的而且是充分的，它们既可以使我们全面有效地概括语法发展的历史规律，又保证我们的理论偏见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样也就可以避免由于某种理论的束缚，扭曲历史事实，或者

忽略某些重要的发展。

#### 1.4 汉语的语序对语法标记的制约

通常人们认为，“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词序和虚词显得特别重要（朱德熙 1985:2）”。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因为汉语选择语序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语法表现手段，所以语法标记或者形态相对就比较少或者不那么重要。这一论断可以从人类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支持。

斯坦福大学著名历史语言学家 Paul Kiparsky 教授在研究了大量印欧语言的发展历史后，得出结论：SVO 语序是最佳、最经济的语法手段（optimal structure）用以表示句子最重要的语法关系（动词居中作为参照点，其前的为主语（通常为施事），其后的则为宾语（通常为受事））。原始印欧语言是 SOV 语序，最近一千年来有不少已经变成了 SVO 语序或者开始向 SVO 语序转变。一种语言在从 SOV 向 SVO 的转变过程中，一个伴随特征是大量丢失形态标记。英语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现代英语跟汉语一样，都是 SVO 语言，但是一千年之前的英语则是属于 SOV 类型的。古英语的形态远比今日的复杂，比如它有区别主宾语的形态标记，名词有性、数、格等各种各样的形态标记，动词不仅有人称、数的语法范畴，而且时体系统也比现在的复杂得多。但是英语在十五世纪左右完全转变成 SVO 语言之后，形态系统大量简化，诸如主宾语的形态标记消失，名词只保留了单复数的标记，动词除第三人称单数外不再有数、人称的区别，等等。有些简化还正在进行之中，比如疑问代词 *who* 的主宾格 *whom* 用法开始混淆，判断系词 *to be* 的人称变化在口语里也不分得那么清楚了。总之，自打英语变成 SVO 语言之后，它只在丢失形态而没有产生任何新的形态。与此同时，最近五百年来英语语法标记产生的途

① 本书的作者之一——石毓智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曾于 1997 年秋季选修了 Paul Kiparsky 的“历史句法形态学”课程。这一问题是课堂上讨论的一个中心。

径也变得与汉语一致起来，即把一个短语片断压缩或者将语音弱化为表示某种语法范畴的标记。例如：

近期将来时：to be going to → to be gonna

祈使句标记：let us → let's

成为语法标记之后，它们的使用范围会扩大，同时也会丢失原来的词汇意义。to be gonna 不再表示动作行为，而是单纯表示时间。let's 也可以用于复数第一人称之外的情况。

Kiparsky 还观察到 只有 SOV 语言向 SVO 变化的现象，而没有相反的发展 即不存在本来为 SVO 的语言向 SOV 转变的现象。这一人类语言发展的共性使得 Kiparsky 相信，利用语序来区别主语和宾语是最有效、最经济的语法手段，也是最优化的方式。Li & Thompson (1974) 基于汉语把字句产生的事实，推断汉语可能是一个反例 正由 SVO 语序向 SOV 转变。Givón 以人类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信念，认为汉语朝这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专门为此申请了一个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以研究。该课题得到当时正在 Oregon 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孙朝奋的协助，研究的成果发表在美国的《语言》(Language) 杂志上。他们通过对大量事实的调查和统计，相当有说服力地证明，现代汉语仍然是 SVO 语言。所以仅有的一个例外也不存在了。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凡是采用 SVO 的语言 形态标记相对简单 凡是采用 SOV 的语言，形态标记相对比较复杂。比如日语是典型的 SOV 语言，它有表示主语 话题 和受事宾语的标记 动词有十余种变形 用以表示体、时、条件、祈使、使成、被动、否定、能愿等。主要有两种原因造成 SOV 语言的复杂形态系统。第一 从功能上看 主语 通常为施事 和宾语 通常为受事 皆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容易造成表达上的歧义，所以倾向于用一种形式标记来区别谓语动词之前的名词的语义角色。所以这种语言大都有主语和宾语的语法标记。第二，从语法化的途径来看，SOV 语言比较容易产生与动词有关的各种语法标记。这种语言的很多成分限制在动词之后，比如助动词、否定词以及各种各样的副词，动词是句子的基本成分之一，一定负载一个重音，而人类语言的一个共同现象是，重音之

后的附着成分的语音成分最容易弱化，如果这些被弱化的成分具有表示动作行为普遍范畴的语义特征，就会成为一种语法标记。SOV语言形态标记复杂化的原因也正是SVO语言形态简单化的理由。

汉语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财富。他们一开始就给我们选择了SVO语序，这就决定了汉语语法的整体特性、语法化的方式和语法演化的方向。这就好比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传下的遗传基因一样，决定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外部特征，诸如肤色、毛发的特征等，也造就了我们的性格、智慧等。如果我们接受像Kiparsky这样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祖先多一份感激，感谢他们为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最佳的标识句子基本成分的手段：语序，这不仅使得我们的语法系统简洁、经济而且有效，也使得我们的语言免于繁琐的形态标记之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语言无需再经历语序变化之累。以往谈汉语优点的多是我们自己人，自己夸自己，难免会被人打个折扣。但是这一次是西方学者根据自己语言的发展总结出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把它推广到汉语，因为近代的中国人比别人更需要自信，包括对自己语言的自信。

## 1.5 汉语历史分期

因为所用的标准或者角度不同，学者们对汉语发展史分期的看法差别很大。尽管历史分期问题不是一个绝对的‘是’或者‘非’的问题，但是一个合理的分期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发展，而且也会使得问题的讨论变得容易方便。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几个有代表性的分期。

### 一、王力(1958)

上古汉语	公元 300 年以前
中古汉语	公元 400 年—1100 年
近代汉语	公元 1300 年—1800 年
现代汉语	公元 1900 年—现在

## 二、吕叔湘 (1985)

古代汉语	公元前 500 年—公元 700 年
早期官话	公元 701 年—公元 1900 年
现代汉语	公元 1901 年—现在

## 三、贝罗贝等 (Peyraube 1998)<sup>①</sup>

早期古汉语	公元前 1400 年—公元前 1100 年
中期古汉语	公元前 1000 年—公元前 600 年
晚期古汉语	公元前 500 年—公元前 200 年
早期中古汉语	公元前 100 年—公元 100 年
中期中古汉语	公元 200 年—公元 600 年
晚期中古汉语	公元 700 年—公元 1300 年
早期现代汉语	公元 1300 年—公元 1400 年
现代汉语	公元 1500 年—公元 1900 年

## 四、孙朝奋 (Sun 1996)

古代汉语	公元前 500 年—公元 200 年
中古汉语	公元 201 年—公元 1000 年
早期官话	公元 1001 年—公元 1900 年
现代汉语	公元 1901 年—现在

上述学者的分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标准和分期的目的不一样。充分考虑到各位学者分期的理由，我们将选择、制定一个适合于我们自己历史考察的分期。我们考察的重点是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因为语言的发展是连续的，而不是突变的，给语言史的任何分期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任意性。在本书的讨论中，将采用下面经过我们自己修正的汉语史分期：

古代汉语	公元前 700 年—公元前 200 年
中古汉语	公元前 199 年—公元 900 年

① 该分期根据的是王力 (1958:35) 和周法高 (1963:432-8)。

早期现代汉语	公元 901 年—公元 1500 年
现代汉语	公元 1501 年—现在

我们考察的主要范围是中古汉语和早期现代汉语。每两个时期交接处都应该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任何突变发生在这里。下面简述一下我们分期的一些理由。

十世纪到十五世纪是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把该时期的汉语叫做“早期现代汉语”。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有些是以前业已存在，但是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并最终形成现代汉语的使用情况；有些则是产生于这个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动补结构发展成为一种稳固的、能产的语法手段，并最终取代了原来的可分离动补组合。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古时期的一些变化往往是造成后来变化的动因。中古时期造就了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直接来源，同时双音化的倾向越来越强烈，这些都是动补结构出现的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部分动补短语开始融合。可是过了十五世纪之后，汉语语法的演化速度就慢下来了，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没有什么新的语法范畴出现，新的发展多为已有的语法范畴的功能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现代汉语形成的时间放在十五世纪左右的原因。

## 1.6 历史语料的选择

在没有考察汉语历史句法形态之前，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是如何选择语料。最理想的语料当然是能够充分反应每个时期的口语状况。但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语料很难见到纯粹的代表某个时期的口语的，往往是书面语和口语的混杂，即它们有可能代表不同时期的语言现象。幸运的是，有不少学者对汉语的口语发展史已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诸如蒋绍愚（1994）和刘坚、蒋绍愚（1990、1992）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成果我们可以加以借鉴。此外，一些常识可有助于我们对历史语料的选择。不同的文体反应口语的程度也不同。一般来说，诗词和散文的书面语色彩比较浓，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

心。下面几种文体反映各自时期的口语程度都比较高。

一、语录体。该类文体是各个时期重要人物或者逸闻趣事的直接纪录，基本上反应当时的口语，最有名的几部代表作品是《论语》、《世说新语》、《朱子语类》等。

二、宗教文献。很多宗教文献，特别是佛典，是以民间传说或者故事来解释教义的，而且他们的观众多是不识字的普通百姓，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语言必须尽量通俗，尽量接近口语的用法。对我们研究最重要的典籍是《敦煌变文》和《祖堂集》。

三、元杂剧。它是风行于十三到十四世纪的一种文学体裁，属于俗文学的一种，脚本由韵文和宾白两部分构成。其中的宾白部分是我们研究当时口语的重要史料。

四、白话小说。这是一种从宋代兴起的文学形式，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先是话本，后来演变成章回小说。作品相当丰富，充分记录了这期间的语言演变情况，是我们研究近代汉语发展的最重要史料。最著名的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材料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元代编写的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都是记录当时口语的珍贵资料。

## 第二章 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

### 2.1 引言

先秦汉语的判断句跟中古以后的明显不同，前者是在句末加上语气词‘也’后者则是在主语和宾语之间加上判断词‘是’。例如：

- (1)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上）
- (2) 他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丈夫。（现代汉语）

前后期的判断句所使用的语法标记性质很不一样。本章就是要探讨第一种形式消失和第二种形式出现的原因。

语法化理论认为(Hopper & Traugott 1993) 语义相宜性和句法环境是诱发一个词汇语法化的两个必要条件。然而并不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词语都一定会语法化，即使有些词语语法化了，它们语法化的程度和方向还会有差别。这是迄今的语法化理论尚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Traugott, forthcoming)。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语法结构的类推有关。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本章采用了 Kiparsky 对于历史语言学中“类推”机制的解释：

类推的方向、范围和具体过程受制于该语言的整体结构特性。

本章的分析表明，一个时期的语言的整体结构特性往往会通过类推诱发一些词语的语法化。Traugott (forthcoming) 指出：“对于一个语法形式产生的句法环境或者篇章组织的深入研究，将使语法化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考察的中心就是导致“是”语法化的句法环境。

判断词“是”演化的全部过程大致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在这期间它由一个普通的指代词演化成一个判断词，而且最后完

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式而成为唯一合法的句式。五世纪之后的汉语判断句一定要求一个判断词连接主语和宾语。“是”在成为判断词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 2.2 目前关于判断词‘是’的来源和产生过程的研究状况

“是”在演化成判断词之前有两个主要的用法，一个是指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或者“那”，另一个是形容词，意为“正确”。有的学者认为判断词“是”来自其原来的指代用法（王力 1958；Li & Thompson 1977 等），有的则认为来自其形容词的用法（冯春田 1985；Yen 1986）还有的认为两种用法都有影响（郭锡良 1997）。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他们的分析，并简述我们的看法。

尽管先秦汉语也存在类似于判断词的词语，比如“为”等，但是从总体上讲，它们是缺乏一个判断词的。当时的判断句范式如例（1）所示。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判断词“是”来自于它原来的指代词用法，其语法化的具体环境为（参见王力 1958；Li & Thompson 1977 等）：

### （3）话题（Topic）回指的“是”（anaphor）+说明（comment）

但是这种句法环境并不能直接导致判断词的产生。因为该篇章组织中的“话题”只能是独立的判断（句子）或者复杂的名词短语，然而判断句中的主语则通常为代词或者单纯名词。此外，在最早的时候，“说明”部分既可以是名词性短语，又可以是动词性短语，两者具有同样的使用频率；然而判断句中的宾语通常都是名词性的。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上述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判断词“是”不能直接从该句法环境中发展出，更不会是一蹴而就。出现“是”用于上述句法环境的最早文献之一是《左传》，然而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是”才有判断词的使用法。我们的兴趣焦点为：判断词出现之前它使用的句法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换，促使它向判断词发展，这是我们确立它产生动因的关键所在。

从人类语言发展的共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三个理由相信判断

词‘是’来自于它原来的指代用法。第一、一个词语的语法化必须在特定的句法结构中进行，不单纯是词义引申问题（Traugott, forthcoming）。后文的分析将会看到指代词‘是’用于回指的偏正结构和表达功能与后来的判断词的用法在结构和功能上相似。第二、促使一个词语语法化的用法必须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Bybee等 1994: 19-20）。第三、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很多语言的判断词都是来自指示代词如 Hebrew, Palestinian Arabic, Wappo, Swahili 等语言 Li & Thompson 1977; McWhorter 1992)。总之，其他语言的类似现象，特别是人类语言的共同发展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语法标记的来源。

那么判断词“是”最早见于什么时代呢？王力（1937, 1990）概括“是”的发展小史为：它始见于公元一世纪 两汉时期稳步发展 五世纪左右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形式。唐钰明（1992）的进一步考察又把判断词‘是’的发展往前推了一些，认为东汉时期判断词‘是’已经广泛使用，它产生的时间应该是战国末年或者是西汉初年。Peyraube & Wiebusch（1994）报告，在公元前 100 年的文献中已经见到判断词“是”的用法。理论上讲，对一个语法标记产生时间的确定是无法绝对准确的。同时一个语法标记从一个词汇向一个语法标记的演化也是渐变的过程，不同学者对判断词的语法性质的认识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对它产生时间的探讨。总而言之，判断词‘是’出现于秦汉之交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冯春田（1985）和 Yen（1986）则认为判断词‘是’源自它原来表示‘正确’的形容词用法。理由为判断词‘是’与其原来的形容词用法的语法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动词性的，且可以受副词修饰。形容词“是”向判断词的演变只是词义引申现象。可是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这种解释的问题。形容词“是”和后来的判断词在句法功能上具有明显的对立：形容词后不能有名词宾语，然而判断词一般要求一个名词宾语。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这种句法差异。

Yen（1986）提出了另外一个假设，判断词‘是’来自于原来形容词的用法，这是受其反义词‘非’的类推而来的。“非”经常位于一个名词性谓语之前来表示否定，它通过类推使得相对的“是”也具有同

样的功能。这一假设也遇到了几个问题。首先，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形容词的“是”用于名词短语之前表示肯定。其次，从标记理论的角度来看，虽然“是”和“非”形成一对具有反义关系的形容词，但是语言中的肯定和否定的表达是不对称的，通常只有否定的一方才会被标记，肯定的一方通常是无标记的。比如现代汉语的“不”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肯定标记。因此，Yen 的说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语法化理论认为，高使用频率是诱发一个词语语法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对于一个多义词来说，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义项最有可能是它语法化的来源。“是”在语法化之前主要是作指示代词用的，而它的形容词用法只占 10% 左右（敖镜豪 1982；杨伯峻 1980, 1981；Peyraube & Wiebusch 1994）。从这一方面来看，判断词“是”也是最有可能来自其指代词的用法。

Feng (1993) 从形式语言学的角度对判断词“是”的出现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他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古汉语里，回指“是”和其后的说明部分之间有一个语音停顿（pause）。在公元一世纪之前，副词只能出现在回指“是”和说明部分之间，但是后来副词前移到“是”之前，把回指的“是”由原来的话题位置推到这个语音停顿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是”被语法化为一个判断词。其过程可以用下列形式表示。

1. Adv. \_\_\_\_\_ 是 [ \_\_\_\_\_ ]<sub>pause</sub> + Comment
2. Adv. \_\_\_\_\_ [ 是 ] + Comment

上式中的方括号代表的就是所谓的“语音停顿”，后来为判断词“是”占据。这种论断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首先，为什么副词会从回指“是”后向前移，作者没有解释。我们后文的分析将说明，副词的前移只是“是”词性改变的一个征兆，显示它由名词性变成动词性的，并不是它语法化的动因。其次，如果 Feng 的假设是对的话，那么历史上应该发生这样两件事：副词前移发生在前，判断词用法出现在后。但是历史事实恰好相反：“是”的判断词用法在公元前 200 年的文献已经出现，真正的副词前移公元 100 年以后才慢慢出现。最后，认为回指“是”和说明部分之间有一个语音停顿也是不可靠的。冯这样认为

的根据是，那时的话题和说明部分常常有一个语气词“者”。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回指“是”和说明部分是没有停顿的，因为那时的语法不允许在它们之间插入任何语气词。

总之，目前的研究已经明确“是”的来源和最早出现的时间。本章则集中讨论“是”语法化的动因和具体发展步骤。

### 2.3 古今汉语判断句式的特点

判断句是最常见的句式之一，主语和宾语之间具有等同、类属等语义联系，或者宾语是描写主语的性质、价值等方面的属性。现代汉语和英语的判断句都是用一个判断词来连接主语和宾语。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两汉之前的汉语的判断句则是运用句末语气词的手段。明白前后句式上的差别有助于历史的考察。

两汉之前的汉语缺乏一个连接主语和宾语的判断词，那时的主宾语之间没有任何语法标记。有时紧随主语之后出现语气词“者”或者“也”，指示一个较长的停顿，但它不是必须的。然而句末语气词“也”则是先秦判断句必须的语法标记。先秦汉语的判断句的格式可以用下式表示：

(4) NP 者 / 也), NP + 也。

例如：

(5) 弓矢者 器也。(易经·系词下)

(6) 麟者 仁兽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可是到了现代汉语判断词“是”则成了判断句必不可少的语法标记，句末语气词消失了。其格式为：

(7) NP<sub>1</sub> + 是 + NP<sub>2</sub>

这种局面大致在五世纪以后就形成了。古今汉语用了两种性质很不相同的语法手段来标志判断句：前期是用句末语气词，后期则是用句中连接动词。

有一种现象需要说明一下。现代汉语允许有限的名词短语直接作谓语，而不一定要求判断词，常见的有时间词短语和个别表属性的名词短语（偏正短语（朱德熙 1982; Li & Thompson 1977））。例如：

(8) 今天星期天。

(9) 她黄头发。

表示时间运动周期某一位置的词语，隐含了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所以具有谓词的特征。比如可以受副词修饰或者加体标记“了”：“今天已经星期天了”。一些偏正短语跟形容词相似，描写主语的属性，所以可以直接作谓语。汉语和英语语法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汉语形容词作谓语不加判断词，英语则必须加。

## 2.4 “是”从指代词向判断词的语法化过程

“是”的整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 1000 余年的时间。早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左传》中，指代词“是”就开始用于回指其前话题的情况，即出现了它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但是直到公元前 100 年左右的文献里，它才开始有了判断词的用法。整个语法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一、回指用法的出现；二、诱发语法化的具体格式的建立；三、新旧判断句式之间的竞争；四、“是”判断式的最后建立。

### 2.4.1 指示代词“是”的篇章功能——回指(anaphor)的出现

在《左传》里，一个复杂的话题通常由一个或者几个判断构成，和说明部分之间常常不加任何标记，如例(10)、(11)所示。然而这种篇章组织已开始用指代词“是”回指其前的话题，同时“是”与其后的部分形成一个“话题+说明”结构的句子，如例(12)所示。

(10) 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左传·隐公四年）

(11)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

(12) 如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左传·隐公二年）